

本來的

孔子

甘霖著

《论语》新解

中華書局

本来的孔子

——《论语》新解

甘霖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甘霖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6
ISBN 978-7-101-13197-0

I.本… II.甘… III.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9272 号

-
- 书 名 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
著 者 甘 霖
责任编辑 张继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1}{2}$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197-0
定 价 38.00 元
-



绪 论

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他说这话时，距离孔子去世至少在三个半世纪以上。今天的我们，比起司马迁，距离孔子的时代要远很多很多。但不变的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想见其本来的面貌：本来的时代、本来的思想、本来的人。这是尝试对《论语》做出一些还原其本义的新努力的目的所在。

一、孔子的时代和他的使命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古代学者视之为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本人怎么看？他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篇》）

孔子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道”的局面，主要表现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并等而下之，“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

孔子说的是实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说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权力为诸侯所掌握。春秋时期的所谓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

就是掌握周天子权力的诸侯,代替周天子发号施令。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是说原有秩序进一步崩溃,诸侯的势力也衰弱了,执政权落到了卿大夫的手里,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崔氏、陈氏等,他们时常代替诸侯与会订盟。再进一步,“陪臣执国命”,像鲁国的阳虎,本是三桓之首季氏的家臣,却把持了季氏的权柄。

这种执政权下移的趋势,反映的是自周初建立起来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也就是封建领主制的统治秩序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而在孔子看来,所谓“十世希不失”、“五世希不失”、“三世希不失”,是说周天子失去号令天下的权力,结果是各国的政权都不稳定,导致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诸侯国内的权力攘夺此起彼伏,整个社会不得安宁。后来司马迁形容这个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上述贵族内部上下等级秩序的紊乱,是共主政治坍塌的结果。周平王东迁,失去了原来直接控制和支配的中央领地,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实际等同于一个小诸侯国。《论语》一书,除“天子”一词作为泛泛的概念出现过两次外,没有涉及周王室的具体内容。

那么贵族与平民的关系呢?孔子所讲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透露了贵族政治动摇的信息。庶人就是有自由身份的平民。他们“议”政,是贵族专政局面被打破的征兆。

所谓“天下无道”,包括上述贵族内部关系、贵族与平民关系的变化两部分,前者是主要矛盾。

这是大势所趋。一次,卫国仪地的边防长官(“仪封人”)对孔子的弟子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八佾篇》)这是说天下无道的

局面已经由来已久了。又一次,隐者桀溺对孔子的弟子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微子篇》)这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两千五百年后的人怎么看这个时代?看法当然很多,但大都认同礼坏乐崩的说法。其中一个重要的看法是,公元前500年前后(当时孔子五十岁左右),中国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张光直,1979)。这是说,政治社会变迁,归根结底是源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不是小变,是大变,是一个大变革时代的表现。在冯友兰看来,是中国历史中一大解放时代(自春秋迄于汉初)的开始(冯友兰,1920)。礼坏乐崩,实质是共主政治的坍塌、贵族政治的动摇,由此引起经济制度、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变化。

总之,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时代。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在他自己,当然是希望通过努力,使“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篇》)他是希望在东方的鲁国复兴西周曾有的礼乐秩序。依据他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篇》)的逻辑,先变齐国,再以鲁国和齐国为基础推开去,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文明。这实质是要恢复一种社会安定有序的局面,并非一成不变的“复辟”。比如他称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宪问篇》),这是以安定天下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囿于原有的等级名分。所以,在孔子看来,“天下无道”这个说法,只是指无序、失序而已,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那么糟糕(如“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之类)。

其次,他以为自己的另一重使命是传承“先王之道”。这是与他的政治使命相配合的文化使命。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篇》)

征者,证也。到夏、殷的故地搜集文献、访求遗贤,作为整理、传授夏礼、殷礼的来源和根据。孔子周游列国,遍干诸侯,希望有人用他为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此同时,他学习、研究夏商周三代文化,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礼乐制度。这固然是为实现政治抱负服务,也是他的文化兴趣。这种文化兴趣不断增强,与政治遭遇的每况愈下形成鲜明对照,整理文献、传之后世便成为他的人生的最后归宿。他说: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

这话当是在他晚年最后几年说的。

按照张光直的说法,青铜时代起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那么,到孔子之时,这种文化已经演进和累积了大约 1500 年了。孔子的文化行为,或是时势使然,或是因他引领,推动先秦中国进入一个文化总结的时代,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

今天我们重读《论语》,追迹孔子,还原本来,当从着眼这个时代开始。

二、孔子的家世及对他的影响

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史记索隐》引《家语》称:“孔子,宋微子之后。”

孔子的六代祖孔父嘉,为宋穆公时的大司马,宋殇公继位时的顾命大臣,后为另一贵族大臣所杀,其子出奔鲁国(《左传》昭公七年杜注)。孔氏,便来自于孔父嘉的字(孔父)。自此之后,孔氏由大贵族(卿)降至贵族的最底层(士)。

孔子的家世,对他的命运和思想带来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商人是被征服的部族。而且,“大邑商”之所以被“小邦周”征服,主要是商纣王丧失内外人心的结果。周武王虽然亲手砍下商纣王的头,他还是基于商人部族的强盛及在东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大影响,采取安抚政策,使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仍居商都故地,以管理商人,同时设“三监”就近监视之。不久周武王去世,武庚联合“三监”及东方诸部族发动叛乱。时摄政当国的周公,用了三年时间平息叛乱,杀了武庚禄父。又封微子启于商丘,“以续殷后”。商都朝歌则由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去镇抚,成为卫国的国都。周公为巩固周王国的政权,大封同姓(姬姓)兄弟、异姓(姜姓)亲戚,在全国各主要地点建立封国,帮助周王室管理分派到各国的商人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以及其他被征服的部族(《左传》定公四年)。

防范商人当是周人的一项国策。虽然到孔子时,去周初已久,周人对商人的监管政策大大松弛,但不会完全放弃,周人对商人的防范心理也不会完全消失。这从商人直至春秋都被当做蠢人看待的现象中,可见一斑。郭沫若说:

殷人被征服了以后事实上是作了奴隶,他们算是受尽了轻视和虐待的,周室的人称他们为“蠢殷”,称他们为“顽民”,一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都还把他们的后人当成蠢人看待,譬如说到蠢人的时候便是“宋人”——“宋人资章甫而适越”(《庄子》)——“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孟子》)——宋

人就是蠢人的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章第二节）

商政权为周人所颠覆，商人未必尽是做了奴隶，但受到不平等对待是必然的。孔子不但是商人身份，而且是商王室后裔，他身上的这个标签始终是醒目的。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僖子，犹称孔子为“圣人之后”，并嘱咐他的儿子师事孔子以学礼（《左传》昭公七年）。大约周人在文化上对商人是逐步宽容的，但在政治上则始终是防范的。那么，孔子受到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他无论是做官在朝堂，还是居家在乡党，都是唯谨唯慎的：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篇》）

这是说孔子在乡里头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在宗庙和朝堂之上表面不慌不忙，却很少说话。其他诸如接引宾客、出使诸侯国、与朋友交往等，《论语》中多有类似的描述，《乡党篇》最为集中。

其次，他对贵族的生活方式是向往的。条件许可时，他是要按贵族范儿生活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同上）

这是说孔子吃饭，主食越精越好，肉丝越细越好，不好的就不吃。一连有好多个“不食”，不具引。其他诸如穿衣、睡觉、出行等，《论语》多有类似的描述，《乡党篇》最集中。冯友兰说：“《乡党》所

纪,起居饮食,俨然贵族。非必孔子之好阔,盖不如是则‘非礼也’。”(《中国哲学史》第四章)其实,讲究礼节,无非显示贵族身份而已。

其时世卿世禄尚未根本动摇,做官仍是贵族的基本专利。孔子虽然做官时间不长,但一直很珍惜曾有的身份。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颜回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孔子没有答应,理由是“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篇》)。齐简公被他的大夫陈恒杀了,其时赋闲在家的孔子,跑去找鲁哀公,要求讨伐陈恒,又被鲁哀公支使去找掌握执政权的季孙、孟孙和叔孙,还是被拒绝了。大约是有人认为他多管闲事,他两次声明“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篇》)。

再次,他对周取代商是心存芥蒂的。这从他对周文王和周武王评价的不同可以看出: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篇》)

周文王已经赢得了天下多数地方的拥戴,但他并没有趁机夺取商的政权,而是继续维持和平的局面,孔子称赞这种行为为“至德”。后来周武王率师攻占商都,商纣王“自燔于火而死”。周武王来到商纣王自焚的地方,“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史记·周本纪》)。商纣王的这个结局是悲惨的,想必孔子对于这个“先王”是有“哀其不幸”之隐衷的。下面这段话,透露了一些信息: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篇》)

孔子在盛赞周文王的同时，对周武王却有所保留：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篇》）

《韶》是舜时的乐，《武》是周武王时的乐。一般认为，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是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来的。而评价《武》乐尽美却未尽善，则因为周武王毕竟是以暴力夺取了殷商政权。苏轼因此认为“孔子盖罪汤、武”，“武王，非圣人也”；“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论武王》）。

孔子自认是绍继周文王的：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

由此看来，孔子并不将文、武同等看待。弟子子贡将文王、武王并举，称“文、武之道”（《子张篇》），未谙老师的用心。

还如孔子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赞扬，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说他俩是“古之贤人”（《述而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篇》），在表达对本族先贤钦心的同时，也透出一种隐隐的痛感。

又次，孔子对祖先的文化“心有戚戚”。虽然对作为统治部族的周文化的尊崇态度溢于言表，——“吾从周”（《八佾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篇》），对殷商文化实给予了更高的赞赏。如称赞微子、箕子、比干：“殷有三仁焉。”（《微子篇》）《论语》全书所载孔子认可为“仁”的，仅此一例。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只是

目 录

绪论	1
凡例	1
学而篇第一	1
为政篇第二	18
八佾篇第三	39
里仁篇第四	63
公冶长篇第五	79
雍也篇第六	103
述而篇第七	126
泰伯篇第八	151
子罕篇第九	169
乡党篇第十	191
先进篇第十一	213
颜渊篇第十二	236
子路篇第十三	252
宪问篇第十四	271
卫灵公篇第十五	303

季氏篇第十六	323
阳货篇第十七	337
微子篇第十八	356
子张篇第十九	368
尧曰篇第二十	384
本书征引书目	391

学而篇第一

(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释〕子曰：先生说。子，对男子的尊称，《论语》中特指孔子。现代汉语将“子曰”译作“孔子说”，不符合《论语》编辑者本意，应作“先生说”。

学而时习之：学了知识，然后按时复习它。学，学习。狭义的“学”，指读书，主要指古代文献。从子路言“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进篇》）这句话，可看出当时一般言学即指读书。广义的“学”，还包括做官（干禄）、行礼、执御等实际知识和技能。时，定时。何晏引王肃：“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也。”杨伯峻：“‘时’在周秦时若作副词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以时’，‘在一定的時候’或‘在适当的时候’的意思。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释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习，复习。之，指所学。

不亦说乎：不也高兴吗？说，读音和字义同“悦”，高兴、喜悦。何晏引王肃：“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悻也。”杨树达：“《为政篇》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时习，即‘温故’也；温故

能知新，故‘说’也。”（《论语疏证》）

有朋自远方来：有求学之人从远处来到。朋，同学。何晏引包咸：“同门曰朋也。”对孔子而言，即学生。

不亦乐乎：不也快乐吗？乐，音勒(lè)，快乐。皇侃：“‘悦’之与‘乐’俱是欢欣，在心常等，而貌迹有殊。悦则心多貌少，乐则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讲习在我，自得于怀抱，故心多曰‘悦’。今朋友讲说，义味相交，德音往复，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乐’也。”张栻：“‘乐’比‘说’为发舒也。”（《论语解》）

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人，这里指有地位的人。刘宝楠：“‘人不知’者，谓当时君卿大夫不知己学有成举用之也。”愠，音运(yùn)，恼怒。朱熹：“愠，含怒意。”不愠，即《述而篇》“君子坦荡荡”。

不亦君子乎：不也是君子〔之所为〕吗？君子，《论语》中的“君子”，有时指有道德的人，有时指有学问的人，有时指有地位的人；有时德、才二者兼举；有时德、才、位三者兼举；有时实有所指，有时为一理想人格。这里指理想人格。

〔译文〕先生说：“学了知识并按时复习，每每有新的收获，不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吗？许多求学者从远方来到，不也更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不也是坦荡荡的君子吗？”

（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注释〕有子曰：有子说。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鲁国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比孔子小四十三岁。《论语》中对孔子的学生多称字，只对曾参、有若、冉有、闵子骞四人尊称“子”。“子”即先生，疑该书编纂，杂有他们的学生的手笔。直接记载有子的话共三章。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作为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那是少见呐。其，泛指某一人。弟，同“悌”，音悌(tì)。皇侃：“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好，音号(hào)，喜好。下同。犯，冒犯。上，在上位者。何晏：“上，谓凡在己上者也。”鲜，音显(xiǎn)，少。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违法乱纪，那是从未有过的。乱，悖礼。作乱，指行悖礼之事，即破坏礼制、礼节。《论语》中的“乱”字属此义者，再如《泰伯篇》：“勇而无礼则乱。”《阳货篇》：“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又：“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犯上、作乱，前者指不恭顺的态度，后者指不规矩的行为。朱熹：“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张栻释“作乱”为“悖理乱常”。有子的这段话，由家庭及于社会，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的。未之有也，可理解为“未有之也”。否定句宾语为代词(“之”)，置于动词之前。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从根本处下功夫，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出来。务，致力，专力。本，本义是树根，这里指事物的根本。下句以“孝弟”解“本”。道，本义是道路，这里指待人处世之道，治国安邦之道，此处泛言，下句以“仁”释“道”，即为仁道。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这两种品德，应该是践行仁道的根本吧？其，表示揣测语气。为仁，行仁。与，同“欤”，音余(yú)，

句末语气词。“仁”是《论语》的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即“爱人”，实践途径为“推己及人”，即由自身及于他人，由家庭及于社会。而孝亲敬长这种人类在家庭中自然生发的感情，便成为仁道的根柢。皇侃引王弼：“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

〔译文〕有子说：“作为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那是少见呐；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违法乱纪，那是从未有过的。君子从根本处下功夫，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出来。孝悌就是践行仁道的根本吧？”

（三）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注释〕巧言令色：〔总是〕好言好语，和颜悦色。巧言，令人动听的话语。令色，讨人喜欢的脸色。何晏引包咸：“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

鲜矣仁：〔这种人〕仁爱之心少啊！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篇》），批评“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篇》），与本章意旨一贯。孔子的批评是较平和的，后世的解释如“外饰言色，内藏荫机”等，负面的成分过重的。

〔译文〕先生说：“总是好言好语，和颜悦色，这种人仁爱之心少啊！”

（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